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

中国

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

邓敏文 著

◆ 中 ◆ 隋唐十国两宋卷



民族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

邓敏文◆著

◆中◆隋唐十国两宋卷

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

民族出版社

CHINESE SOUTHERN ETHNIC LITERATURE RELATIONSHIP HISTORY

《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

鉴定结论

《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前沿课题，不仅在学术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从文学角度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正确描述中国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渊源和现状方面，也有重要的意义。

由邓敏文、罗汉田、刘亚虎合作的这个项目，从已完成的书稿上看，对材料的挖掘做了大量的工作，掌握了丰富的资料，其中有的是第一次挖掘出来的，为课题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书稿阐述富于逻辑性，探讨较为深入，有不少创见，令人耳目一新。例如上卷第四章“屈原与楚辞”对楚辞与南方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挖掘比较全面，言之成理；中卷第三章“南方各族的汉文创作”对汉代至唐宋汉文化在南方的传播及其产生的影响作了较深入的描述，脉络分明；下卷第三章“南戏传奇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流传”对南方少数民族剧目受南戏影响的考证多有见地。关于南方各族文学对中华文学的影响，该书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中国文坛多南风”

等，从文学影响的双向运动的角度阐明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辐射力，确为新的见解。

总之，这个课题的最终成果已达到了该领域目前研究的前沿，建议给予结项。个别地方稍作调整，一些提法稍加斟酌，即可成为创新之作交付出版。

说明：本鉴定结论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意见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科研处的安排，于2000年7月24日在鉴定会上集体作出的。参加鉴定的专家有中央民族大学梁庭望教授、张公瑾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吕微副研究员、降边嘉措研究员、白庚胜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文学片主管干部周志宽研究员及本书责任编辑、民族出版社傅肇霞编辑出席了鉴定会。

编写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仅中国南方就有三十多个现代民族。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分有合，有来有往。各族人民在这分分合合与来来往往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文学交流也在其中。

随着南方诸多民族文学史著作的相继著就和陆续出版，我们产生了编写《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的念头，并于1991年作出规划。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个规划一直未能如期实施。1995年，《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课题正式启动：刘亚虎负责“先秦秦汉及魏晋南北朝卷”（上），邓敏文负责“隋唐十国两宋卷”（中），罗汉田负责“元明清卷”（下）。1997年，该课题被正式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项目。

这是一项难度很大且无任何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工作。我们深知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有限，但我们还是冒着风险走过来了，其中的艰难困苦无须赘述。

这是一部统一规划而又相对独立的三卷本文学关系史。我们没有设立主编，其主要目的是使各位著者

有更多的自由选择和自由创作。我们虽作了三个时段的大体分工，但并不局限于本时段的文学关系，根据需要，有时也采用“纪事本末”的叙述手法交代某些文学关系的来龙去脉。这样一来，难免会出现某些内容上的重复，请读者见谅。

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一项史无前例、难度很大的工作，而我们的能力和水平又十分有限，所以这部书不可能像人们所企盼的那样完美，最多也只能达到我们所设想的那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多少，写多少；不知部分，留给后人。

最后，我们衷心感谢院、所领导，各位同仁，出版部门对此项工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我们也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

邓敏文

2000年6月5日于北京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南方民族文学交流的使者	(21)
第一节 王昌龄与“洞蛮乞诗”	(22)
第二节 李白与长江流域的浪漫诗风	(34)
第三节 杜甫与“夔州僚人”	(47)
第四节 刘禹锡与“巴渝遗音”	(58)
第五节 柳宗元与“柳州峒氓”	(66)
第六节 韩愈等人与“岭南蛮夷”	(75)
第七节 苏轼与“海南黎人”	(83)
第二章 南方各族的汉文创作	(97)
第一节 汉文的广泛传播和影响	(97)
第二节 张九龄与中南各族汉文创作	(115)
第三节 《大宅颂》与《智城碑》等	(122)
第四节 《德化碑》与西南各族汉文创作	(130)
第五节 多民族共同语文学的形成与意义	(152)
第三章 南方民族与南国诗风	(163)
第一节 浪漫诗风之胜地	(163)

第二节	田园诗风之沃野	(173)
第三节	婉约诗风之温床	(179)
第四节	隐逸诗风之佳境	(188)
第四章	宋词寻根	(197)
第一节	词根生南国	(197)
第二节	南方民族对词的贡献	(201)
第三节	文人之词的自绝之路	(210)
第四节	民间之词的自在之路	(215)
第五章	南诏大理国多民族文学关系	(225)
第一节	多民族王国的建立与盛衰	(225)
第二节	西南各民族的内外交往	(228)
第三节	“人知礼乐，本唐风化”	(238)
第四节	《火烧松明楼》等多民族历史传说	(242)
第五节	《望夫云》等多民族风物传说	(250)
第六节	“本主”故事的多民族性	(256)
第七节	农牧文化杂交的丰硕成果	(260)
第八节	佛教对南方民族文学的影响	(270)
第六章	歌谣体系	(281)
第一节	南方民族歌谣体系的形成	(281)
第二节	唐宋时期南方各族歌谣概况	(290)
第三节	内容体系	(300)
第四节	格律体系	(309)
第五节	传播体系	(318)
第六节	岭南“歌仙”刘三姐	(323)

第七章 史诗杂糅	(331)
第一节 南方民族史诗的形成与发展	(331)
第二节 史诗的纵向杂糅	(352)
第三节 史诗的横向杂糅	(360)
第四节 史诗的地位和影响	(368)
第八章 传说的相互借鉴	(373)
第一节 从神话走向现实	(373)
第二节 历史传说的相互借鉴	(375)
第三节 风物传说的相互借鉴	(386)
第四节 山水传说的相互借鉴	(392)
第五节 爱情传说的相互借鉴	(395)
附录	(403)
中国古代汉语文学家统计表	(403)
中国古代汉语文学家分布表	(405)
主要参考书目	(414)

绪 论

本书所说的南方，是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国疆土，包括江汉平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珠江两岸及南海诸岛等。这是一片广阔、美丽、富饶、古老和充满生机活力的土地。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既有崇山峻岭，又有平川大坝；既有江河湖海，又有沃土肥田。这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世界、鱼米之乡。



南方各民族的祖先，很早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1956年和1976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我国云南省开远县和禄丰县境内发现“拉玛古猿”化石，其生存年代距今约一千万年至一千五百万年。^① 1965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云南省元谋县境内发现两颗猿人牙齿化石，经古地磁法测定，“元谋人”的生存年代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较“北京猿人”更为原始。^② 1986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四川省巫山县境内发现古人类化石，其生存年代与“元谋人”大体相当。^③ 1975年和1980年，考古工

① 江宁生：《云南考古》，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② 江宁生：《云南考古》，2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③ 王世晋：《光明日报》1986年11月30日头版报道。

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在长江和珠江流域多有发现。如生存于今广东曲江县境内的“马坝人”，生存于今湖北长阳县境内的“长阳人”，生存于今广西柳江县境内的“柳江人”，生存于今四川资阳县境内的“资阳人”等。此外，还有分布于今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分布于今浙江、江苏境内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分布于今广东、福建等地的“石峡文化”和“昙石山文化”等等。

关于中国南方原始族群的文献记载，大多出于春秋战国之后的汉文典籍，而且大多是根据前人的口头传说。如《尚书·吕刑》载：“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东汉郑玄（公元 127 年～公元 200 年）（以下均略去“公元”、“年”字样）认为：“苗民即九黎之后，颡项诛九黎，至其子孙为三国。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臣尧，又窜之。后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

② 江宁生：《云南考古》，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禹又诛之。”^①《史记·周本纪》载：古公（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虞仲“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索隐》载：“越在蛮夷、少康之后，地远国小，春秋之初未通上国，国史既微，略无世系。”

这些记载说明：两千多年以前，南方各民族的祖先已经和中原汉族的祖先有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这种交往必然会影响到各有关民族文学的发展。屈原、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及其作品的产生，就是这种南方文学和中原文学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

先秦、秦汉直至隋代，南方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或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唯长江中下游地区于春秋战国后期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其社会发展较中原地区相对缓慢，故中原地区的汉族祖先习惯将南方各民族的祖先统称“南蛮”或“南夷”。其中包括苗瑶（或盘瓠）系统诸民族、百越系统诸民族、百濮系统诸民族和西羌（南支）系统诸民族。他们分别是今日苗、瑶、壮、侗、傣、布依、黎、白、彝、纳西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祖先。

隋唐以前，汉人“夷化”的现象在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已普遍存在。秦汉之际，已经有一些中原汉人随军或别的原因来到“南夷”地区定居，但人数还比较少。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夷”地区的汉族人口迅速增多，中南、东南、西南地区已普遍出现汉人聚居区。由于这些汉人掌握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又有中央封建朝廷作为政治后台，所以他们当中的上层人士很快能成为当地的政治和军事头领，“南夷”地区的“汉族大姓”由此产生。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

^①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十九。

治权利，这些“汉族大姓”不得不变服随俗，以“和集南夷”与中央封建王朝分庭抗礼，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如《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公孙述时，（牂牁）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此处讲的是牂牁大姓与当地官员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公孙述的情况。同传又载：“及王莽政乱，以广汉文齐为（益州郡）太守，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两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悦夷，甚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文齐之所以能“固守拒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行了“降集悦夷”的政策。诸葛亮南征后，也实行“南抚夷越，北伐中原”的战略方针，他不但不铲除“南中大姓”，还利用他们提供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军用物资。这样一来，“南中大姓”不但没被削弱，反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其中以霍、孟、雍、吕、爨等大姓为最显赫。^①

秦汉以降，“夷人汉化”的现象也在东南、中南和西南地区加速进行。历史文化名城桂林是岭南地区的北大门，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驭蛮”中枢之一，是中原文化向岭南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前哨阵地，也是中南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桂林历史悠久，据宝积岩洞穴遗址发现，距今约三万年前，已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远古居民在今桂林市一带活动。据甑皮岩洞穴遗址发现，距今约九千年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古代居民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公元前 387 年，楚悼王派大将吴起“南开百越”，桂林归楚。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派尉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攻百越，“一军塞镡城

^① 王文光：《云南民族的由来与发展》，34 页，云南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

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淮南子·人间训》）。由于受到当地越人——西瓯军的顽强抵抗，秦将屠睢毙命，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因岭南地区山高林密，交通不便，秦军“无以转饷”，其先头部队遇到了粮草供应不上的问题。于是秦始皇又派史禄“以卒凿渠，而通粮道”，并迫使中原地区的人民“丁男被甲，丁女转输”。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和激烈战斗，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终于“略取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从此岭南地区开始正式纳入统一的封建国家的版图，岭南地区各族人民与中原地区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日益频繁。

秦末汉初，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中原地区战火频仍。南海郡尉赵佗趁机略取桂林、象郡，割据岭南并受封为南越王。汉武帝元鼎五年（前 112），南越丞相吕嘉反叛并杀死汉王朝派去的使者及南越王赵兴等，企图割据，脱离汉室。汉武帝得知，即派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十万楼船分别由湘、赣、桂、黔进攻南越，又派归义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直指番禺（今广州）。公元前 111 年，平叛的各路大军会师番禺，岭南地区重归汉室。汉武帝为加强对岭南地区的集权统治，便将桂林、南海、象三郡改为九郡，归交州管辖，并将原桂林郡北部的一些地方划为始安县，归荆州零陵郡管辖。从此，岭南地区各族人民与中原汉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分分合合，隋唐时期，南方各民族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除僻居山险的少量“僚”、“蛮”、“山越”及“俚”人外，大多已成为编户之民而同汉人融合，唯今鄂西、湘西、广西、海南、台湾、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还分布着成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如分布于鄂西南、湘西北及川东、黔东等地的“施州蛮”、“溪州

蛮”、“朗州蛮”、“渝州蛮”及“黔州蛮”等，他们分别是今日土家、苗、仡佬等现代民族的先民；分布于湘西南、黔东南、桂西北边缘地区的“牂牁蛮”、“武陵蛮”、“梅山蛮”、“东谢蛮”、“西赵蛮”、“江南蛮”、“飞山蛮”、“抚水蛮”、“环州蛮”以及“莫徭”、“桂阳监徭”等，他们分别是今日苗、瑶、侗、水、仡佬等现代民族的先民；分布于桂西北、黔西南、滇东南的“南丹蛮”、“西原蛮”、“广源蛮”等，他们分别是今日壮、布依、毛南等现代民族的先民；分布于桂东南、海南岛及台湾岛的“黎”人、“琉球”人等，他们分别是今日黎、畲、高山等现代民族的先民；分布于川东的“僚”人或“巴”人等，他们分别是今日仡佬、土家等现代民族的先民；分布于川南、黔西及云南各地的“乌蛮”、“白蛮”、“施蛮”、“顺蛮”、“么些蛮”、“和蛮”、“锅锉蛮”、“裸形蛮”、“寻传蛮”、“茫蛮”、“扑子蛮”、“望蛮”等，他们分别是今日彝、白、傈僳、怒、纳西、哈尼、基诺、阿昌、景颇、傣、布朗、德昂、佤等十几个现代民族的先民。

唐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偏居祖国中南、东南和西南地区的南方少数民族，在强大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下，大多有条件跨越奴隶社会而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尤其是居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少数民族，其社会发展速度较西南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更快。

从唐朝末年至北宋初年，即从公元 907 年石氏后梁立国到公元 979 年刘氏北汉灭亡，中国又出现了暂时的分裂局面。在这七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大地战乱频繁，各地各民族统治者你争我夺，你立我亡，其国运都十分短暂，其更迭也十分迅速。在北方及中原地区，主要有朱氏后梁（907～923）、李氏后唐（923～936）、石氏后晋（936～946）、刘氏后汉（946～

950)、郭氏和柴氏后周(951~960),合称“五代”。其中国运最长者16年(后梁),最短者3年(后周)。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东南、中南及西南地区,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国家,其中有马氏的楚(907~951)、王氏的前蜀(908~925)、钱氏的吴越(908~932)、高氏的荆南(913~963)、刘氏的南汉(917~971)、杨氏的吴(919~937)、王氏的闽(933~945)、孟氏的后蜀(934~965)、李氏的南唐(937~958)、刘氏的北汉(951~979),这些都是南方各地汉族统治者建立的割据政权,合称“十国”。其中命运最长者54年(南汉),最短者12年(闽)。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如在今日云南等地,由“乌蛮”蒙氏所建的南诏政权灭亡之后,又有郑氏“大长和国”(897~927)、赵氏“大天兴国”(927~928)、杨氏“大义宁国”(928~937)、段氏“大理国”(937~1253)等割据政权相继出现。

“十国”的范围,除北汉据有山西一隅之外,其他九国均在长江及珠江流域的中国南方,即西起四川,东至江淮,南达两广,其总面积不比“五代”统辖的区域小。由于正统观念的关系,人们多知“五代”,而少知“十国”。“十国”的一些史事虽在新旧《五代史》中有所记载,但也由于正统观念的作用而被视为旁支,如《旧五代史》将吴越、楚、荆南三国列为“世袭列传”,将吴、南唐等七国列为“僭伪列传”。《新五代史》则一律列为“世家”。而疆域广阔、国力雄厚、延续数百年之久的南诏及大理国,也只能附着于《唐书》、《宋史》的“西南夷列传”之中。从当时全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情况来看,“十国”的经济和文化显得更为重要。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中称:“唐末和梁、唐、晋、汉四朝,黄河南北广大地区遭受严重的战争破坏。唐末杨行密割据淮南,阻止北

方的战乱波及长江流域，南方诸国得以稳定内部，发展经济，虽然不免也有战争和暴君，比起北方来，却显得较为安宁。全中国政治统一是符合人民基本利益的好事，但在五代大乱的情况下，南方立国分治，并不是坏事。南方民众受统治者的祸害轻一些，这就是诸国暂时存在的理由，一切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标准，不能单凭统一与分治的形式来判断好坏。”他又说：“从此以后，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也确实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从中国文学发展上看，“十国”的重要性更为清楚。“五代十国”期间产生的“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兴文体，而当时“词”的创作，主要是在西蜀和南唐。中国第一部词集《花间集》的作者大多是西蜀文人，当时的著名词人李璟、李煜（李后主）、冯延巳等也都是南唐的君臣。“花间词”的绮丽繁缛，南唐词的清秀俊逸，也一直为后代词人所称颂。这些词的产生与繁荣又与当时当地南方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及传统文学关系密切。

宋代，南方各民族的分布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除僻居山险的少量“僚”、“蛮”之外，其他少数民族大多已转移到湘西、川东、桂西、桂北等中西部山区，并使这些地区逐步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如《宋史·抚水州蛮》载：“抚水州（其治所在今广西环江县）在宜州（其治所在今广西宜山县）南（北），有县四：曰抚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劳。唐隶黔南（黔南路，其治所在今广西融水），其酋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镇（在今广西罗城县地）。民则有区、廖、潘、吴四姓，亦种水稻、采鱼，其保聚山险者，虽有畲田，收谷粟甚少，但以药箭射生，取鸟兽尽，即徙他处，无羊马、桑柘。地曰昶洞，